



人权理事会

第二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和 4

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需要理事会注意的人权情况

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2014 年 3 月 26 日致
人权理事会主席的信

我拜读了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2014 年 2 月 24 日致人权理事会主席的信(A/HRC/25/G/14)。

令人遗憾的是，定期散布阿塞拜疆当局肆无忌惮攻击我国的陈词滥调成了阿塞拜疆代表团的习惯做法，例如，作为人权理事会第十九届会议的文件分发的一封信被改头换面变成了第二十届会议的一个文件，如今，又出现在第二十五届会议上。

阿塞拜疆政府歪曲事实，不断误导国际社会，猜测受害者的记忆，为自己的政治目的利用霍贾利的悲剧事件，不择手段地败坏亚美尼亚的名声；对此，亚美尼亚共和国已经作了口头回应，并通过散发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外交部准备的资料(见 A/HRC/19/G/10 和 A/HRC/22/G/16)作了答复。

我们重申我们的观点：人权理事会不是一个让人不断发表虚假言论、进行政治投机和歪曲事实的地方，也不是根据“谎言重复千遍就变成真理”的信条让其他国家卷入无休止的一轮又一轮的相互指责的地方。

旨在使霍贾利军事基地中立化和取消对机场的封锁的军事行动开始于 1992 年 2 月 25 日夜間 11 时 30 分，结束于 2 月 26 日凌晨 3 时。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自卫军的部队留出了一个人道主义走廊以便平民安全离开军事行动区，



这一点已经提前通知阿塞拜疆方面。走廊沿卡卡河从霍贾利的东端延伸到东北方向，又从居住区的北端延伸到东北方向。然而，阿塞拜疆当局没有将平民撤出军事活动区。后来拍摄到很多被杀害平民尸体的该地区位于距阿格达姆 3 公里、距霍贾利 11 公里的地方。该地区在 1993 年夏季阿格达姆陷落之前一直在阿塞拜疆部队控制之下，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军队不可能进入该地区的任何地方。

按照阿塞拜疆常驻代表信中所表示的逻辑，我要再次提一下那段时期包括阿塞拜疆来源在内的媒体上的报道，以说明霍贾利事件的真相。

据阿塞拜疆记者 M. Safarogly 说，“霍贾利占据着重要的战略位置。失去霍贾利对 Mutalibov 意味着一次政治惨败”。

Mutalibov 辞职一个月后接受了捷克记者 Dana Mazalova 的采访，采访情况发表于 *Nezavisimaya Gazeta*。谈到霍贾利时，Mutalibov 提到：

据逃离的霍贾利居民说，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推翻我。某些势力设法败坏总统的声誉。我不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行动非常熟练和谨慎的亚美尼亚人会让阿塞拜疆人得到暴露他们法西斯行为的任何文件。一般的推理是：亚美尼亚人确实留下了一条供人们逃离的走廊。那么，为什么他们需要开枪呢？特别是在靠近霍贾利的一个地区，在那里有足够的部队能出来帮助人们。

约 10 年后，阿塞拜疆前总统在接受 *Novoye Vremya* 杂志采访时确认了他的判断，他说，“对霍贾利居民的屠杀明显是某人安排的，其目的是在阿塞拜疆发动政变”。

阿塞拜疆独立摄影记者 Chingiz Mustafayev 于 1992 年 2 月 28 日和 3 月 2 日拍摄了一些照片；他怀疑阿塞拜疆的官方说法，因此，进行了自己的调查。该记者向莫斯科新闻社 *D-press* 提供的关于可能的阿塞拜疆方阴谋的第一个报告就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在距阿格达姆不远的地方被杀害，当时的情况还有待说明。

阿塞拜疆人权积极分子 Arif Yunusov 1992 年 7 月在 *Zerkalo Azerbaijani* 报上发表文章说，“这个城市及其居民都被故意作了政治目的的牺牲品”。

ukhalifat Azerbaijani 报 1992 年 4 月 28 日报道，时任阿塞拜疆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的 Tamerlan Karaev 曾说，“悲剧是阿塞拜疆当局制造的，具体地说是一名高级官员制造的”。

Heydar Aliiev 自己承认，“阿塞拜疆的前领导(对霍贾利事件)也是有罪责的”。然而，据 *Bilik Dunyasi* 社说，1992 年 4 月，他表示了一个极为恶毒的想法，说，“我们将受益于流血。在事件过程中，我们不当干涉”。

后来，人民阵线的代表上台，阿塞拜疆前安全部部长 Vagif Guseynov 在被捕之前曾简短地说，“1990 年 1 月的巴库事件和霍贾利事件都是同样一些人干的”，暗示是阿塞拜疆人民阵线的一些政治人物。

2005 年 2 月，阿塞拜疆独立杂志 *Monitoring* 的记者 Eynulla Fatullaev 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逗留了 10 天，他在他的材料和采访中介绍了他的访问情况。他也大胆表示怀疑巴库官方关于某些霍贾利居民死亡的说法的真实性：

10 年前，有一次，我遇到临时住在纳弗塔兰的一些霍贾利难民；他们坦诚地告诉我：在攻击的前几天，一些亚美尼亚人借助高音喇叭不断警告居民将采取预定的行动，建议平民离开居住区，通过一条沿着卡卡河的人道主义走廊突破包围。即便是霍贾利人也说，他们利用了这条走廊，走廊另一侧的亚美尼亚士兵没有真地向他们开枪。我熟悉了那个地理区域，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关于不存在一条亚美尼亚走廊的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走廊确实存在；否则，被完全包围、与外界隔绝的霍贾利民众就不可能突破包围。但是，通过卡卡河之外的地区之后，难民们分成了两部分，由于某种原因，一部分逃向了 Nakhijevanik。显然，人民阵线的军队在他们推翻 Mutalibov 的路上追求的是更多地流血，而不是解放霍贾利的居民。”

2005 年 3 月 2 日，在 *Monitoring* 刊登了 Eynulla Fatullaev 的第一个来自卡拉巴赫的报告几天之后，该杂志的编辑 Elmar Guseynov 就被一个身份不明之人枪杀在巴库他的家门口。Eynulla Fatullaev 被根据包括叛国罪在内的一系列指控判刑。

阿塞拜疆前国防部长 Ragim Gaziev 也确认说，“在霍贾利为 Mutalibov 准备了一个陷阱”。利用这种办法，霍贾利居民屠杀的策划者同时实现了两个目的：他们推翻了苏联崩溃之后不再有用的 Mutalibov，同时为发起一场大声指责亚美尼亚使用不人道战争方法的运动找到一个理由。自 1992 年 2 月 13 日以来，阿塞拜疆军队一直在有计划地发射“格拉德”火箭弹，目的是摧毁有 55,000 名居民的 Stepanakert 城和附近的其他亚美尼亚人居住区；这个事实却被忽略了。

1992 年 4 月 28 日，一位霍贾利妇女在接受《赫尔辛基观察》报采访时说，亚美尼亚人曾发出最后通牒说[...], 霍贾利居民最好打着白旗离开城市。Alif Gajiev(霍贾利的防卫领导人)于 2 月 15 日(攻击前 10 天)通知了我们这一情况，但这并没有吓住我和其他人。我们根本不相信他们会夺取霍贾利。”

然而，在警告之后，霍贾利的多数平民得知了计划的行动，决定迁移到一个安全地方。对霍贾利居民的大规模迁徙，阿塞拜疆的电视和电台都作了广泛报道。阿塞拜疆的大众媒体对离开霍贾利的人故意表示了一种不屑态度，不断诋毁他们。我们应当指出的是，被变成一个城市的霍贾利，首先离开那里的只是那些被强迫搬到那里的人，主要是梅斯赫特土耳其人，虽然他们不断受到阻挠。另外，接到亚美尼亚方面警告的霍贾利市政府也曾请求援助撤走居民，但徒然无果。霍贾利在一次接受 *Megapolis-Express* 报(莫斯科)采访时说，“听到关于预定的夺城行动的消息之后，我曾向阿格达姆请求派直升飞机撤出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向我们保证，正在准备采取行动打破包围。但是没有提供任何援助。”然而，人民阵线阿格达姆分部理事会成员 R. Gajuev 说，“我们本来能帮助霍贾

利居民，因为我们具备适当的力量和能力。但共和国领导人却要向人们显示他们没有力量，希望呼吁独联体军队再来帮助并在其支持下镇压反对派。”

概括一下上述情况，我们可以说，霍贾利的居民变成了巴库当局所玩肮脏游戏的人质，它后来又將这一悲剧变成了操纵和控制的政治工具。通过经常提起霍贾利问题，巴库当局试图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使其无视在苏姆盖伊特、巴库、基洛瓦巴德、汉拉尔和阿塞拜疆的其他居住区对其本国的亚美尼亚裔公民的屠杀；实际上，远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前，在阿塞拜疆全境就开始了對亚美尼亚人的清洗。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边境居住区同样进行了清洗，特别是在 Maragha 村，1992 年 4 月，入侵的阿塞拜疆正规军部队杀害了约 100 名平民。

遗憾的是，在阿塞拜疆常驻代表的信中，这些情况竟完全被悄悄地忘记和忽略了。

同时，我想对阿塞拜疆常驻代表信中唯一的新段落表示一下看法；他试图在其中为想象和完全虚假的指责制造一个“坚实的法律依据”。我感到高兴的是，阿塞拜疆方面已经研究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明白了灭绝种族一词的含义。我希望阿塞拜疆代表团还研究了这一词汇的词源和历史；Raphael Lemkin 在阐述灭绝种族罪时曾提到在奥托曼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实行的大规模清洗政策本身。当阿塞拜疆当局在其人民面前被追究责任、可能还会因对霍贾利的阿塞拜疆居民犯下的罪行面临审判时，这一知识肯定是有益的。

谨请将此信作为人权理事会第二十五届会议议程项目 3 和 4 下的一个文件分发。

大使、常驻代表
夏尔·阿兹纳武尔(签名)